

顾冠华 编著

小说谋略
故事精粹

XIAOSHUO MOULUE
CUI



·顾冠华 编著

小说谋略 故事精粹

河海大学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13号

责任编辑 潘仲华

小说谋略故事精粹

顾冠华 编著

出版发行：河海大学出版社
(南京西康路1号，邮政编码：210024)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扬州市公道印刷厂

(地 址：扬州北郊公道镇 邮政编码：225119)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6.375 字数424,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630—0449—1

I·21

定价：5.60元

河海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 谋略，这是一个既寻常又神秘的字眼。数千年来，它经过人类智慧乳汁的不断浇灌和哺育，变得越趋丰富和闪光。它很寻常——古今中外，人们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管理、交际等社会实践活动的一切领域都广泛运用着谋略。它又很神秘——作为一种特效而神奇的软件武器，常使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败为胜乃至“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同时，它是施谋主体高级思维活动的产物，并在相当秘密的状态下构设和实施，人们多不易把握这种复杂的智能心理的种种奥妙和基本规律，而常慨叹其“神机莫测”……

历史的车轮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人们在现代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现代科学方法的帮助下，通过对谋略宝库的发掘、爬梳，对各类型宏观和微观谋略实践的分析研究，科学地揭示了谋略的本质、机理、结构、方式、原则和谋略的创造等基本问题，并形成了一门崭新的综合学科——谋略学。

谋略，它是竞争性社会中社会活动主体在明确的动机驱使下，针对被作用客体的特点恰当地预设自己的活动并使被作用客体发展符合主体预定的指向、目标而进行的思维活动；它是主体的认识、意志、思维等多种心理机能的综合产物。谋略具有多种特性，其大要者如下：

功利性：利，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是国家、集团及个人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作为一种行动方案的谋略无不具有功利性。这包括两层涵义：第一，功利是谋略的动机和目的。

一切谋略都是施谋主体为了获取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利益的产物，施谋主体设计的最优化方案均力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孙子兵法》的谋略指导思想是“非利不动”、“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兵经百字》的虑谋原则也是“行兵用智，须相其利。”第二，功利是谋略内涵的主要构成要素。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共性心理，“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施谋主体针对这一心理，以表面的、暂时的、局部的、虚假的利益诱使施谋对象趋利忘害而在对策和行动上发生错误，最终让施谋主体获得长久的、全局的、本质的利益。

合规律性：施谋主体的虑谋动机和目的必须符合作用对象及与之有关的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如果仅从主观愿望出发而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内在规律，则其谋略便不可能成功。这说明，人们施谋展略、运筹帷幄，不仅要着眼于主观的必要性，还须考虑客观的可能性，将二者协调完美地统一起来。

对抗竞争性：对抗、竞争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对抗、竞争必然促使各方更多地寻求、借助于智慧的力量。实践证明，无论哪一领域，其对抗、竞争越为激烈，其谋略的创造与运用就越为显著和出色。列宁指出：“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带白手套的“革命家”》）军事领域中的谋略所以发展得极其繁富、成熟，就在于军事战争具有非常强烈的对抗竞争性。

交叉适用性：只要有竞争、有对抗，就会产生和运用谋略。而社会生活中具有竞争、对抗性的领域是相当广泛的，尽管竞争、对抗的显隐程度和强弱程度有所不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矛盾体，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因此，自古以来，谋略从来就不是军事领域的专利，而是同时渗透、活跃在政治、经济、管理、司法、劝谏、交际、教学等各个领域。人们对此也许会有疑问——譬如，爱情婚姻中是否也存在对抗、

竞争以至同样存在谋略呢？回答是肯定的。这对抗、竞争便是人们对自由婚姻、幸福爱情的渴望、追求与包办、买卖、强权婚姻和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及世俗偏见的抗衡、斗争；这谋略便是弱小的真、善、美如何依靠智慧的力量战胜强悍的假、恶、丑。而这可以采取“走为上”计，也可以采取“瞒天过海”计、“金蝉脱壳”计……可见，同一谋略，往往既适用于此领域也适用于彼领域。在商品经济社会中，随着竞争的加强，谋略的这种交叉适用性便更为明显。

求异性：谋略制胜的原因之一是出奇制胜，越奇便越能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因此要求虑谋制略能“战胜不复”、“形于无穷”（《孙子兵法》），不断予以创新、变化，不断求奇、求异。这就必须突破常规性、单向性、趋同性思维的框架，力求进行多向性、发散性、求异性思维，别出机杼，独制奇谋，使之既合乎情理又出人意料。

层次性：谋略分有宏观韬略、中观策略、微观谋术等若干层次。高层次的谋略可派生、统摄若干低层次谋略。例如，“因敌制胜”是指根据施谋对象的具体情况使用不同策略而获胜，施谋对象具体情况的不同，决定着施谋主体应策方法的不同，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具体条件下的谋略：对贪利对象，用“利而诱之”；对骄横对象，用“卑而骄之”；对鲁莽对象，用“怒而挠之”。而在“利而诱之”中，又根据具体情况可分别采用“实则虚之”、“诈败诱敌”、“悬利使争”等更具体的谋略。

预见性：谋略是竞争行动的指南和蓝图，它指向未来，因此对事态的每一具体阶段、环节的发展和结果，它具有准确的预见并据此预定可行方案和调控措施，使事件始终按预定程序和轨道发展而到达目标。《礼记·中庸》云：“凡事豫则立，不

豫则废。”科学、准确的预测，是谋略获得成功的基础。

多元协同性：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为了某一对抗的胜利而常采用多个子谋略。这些子谋略发挥的作用虽各不相同，但都共同围绕并服务于一个中心目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甚至环环紧扣、层层相因。例如流传千古的战国时期齐魏马陵之战即然——在整体上，孙臆采取了“围魏救赵”的韬略，而其具体的实施，却是多个子谋略的协同运用：一开始，韩求救于齐，孙臆建议“以逸待劳”，虽答应救援却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待其两败俱伤时，方予出兵，既救垂亡之韩，使之更感恩于齐，又攻疲惫之魏，诚系“一箭双雕”之上策。孙臆又以“攻其必救”之谋挥兵直指魏都大梁，魏军果然回师自救；根据魏军将领庞涓刚愎自用、骄狂轻敌的特点，孙臆又以“能而示之不能”和“增兵减灶”之计“卑而骄之”，诱其深入；并在敌国境内的马陵主动设伏——施“反客为主”之谋，大败魏军。他以削弱魏国并使自己获益的目的为轴心，构成一个多元协同的谋略整体。

机密性：谋略在对抗中制胜的根因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就必须做到谋略内容的高度保密。古人云：机事不密则害成。实践表明，保密是谋略成功的保证，而泄密则是其失败的根源。

工具方法性：任何谋略都是人们为达到某一目的所借助的一种工具、一种方法。理论形态的谋略并无美与丑、善与恶的性质区分，也没有正义之阴谋与邪恶之阴谋的区分。有些人将谋略分为阳谋与阴谋，并认为阳谋是善良正直、光明磊落之士的韬略，而阴谋则是卑鄙无耻、奸佞险恶之徒的谋术；因此，将“阳谋”视为智慧的象征而给以赞赏、推崇，将“阴谋”视为丑恶的帮凶而予以指责、唾弃。其实，谋略作为一种思维活动

如同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推理等方法一样，可以被任何人所运用。同一谋略，正直善良者可以用来对付邪恶者以实现其正义目的；而邪恶者也可以用来扼杀、毁灭正义以达到其罪恶目的。如果说阴谋是不可告人之谋的话，那么从谋略的特性看，其机密性决定着一般谋略都应严格保密而不可外泄、不可告人。如果说阴谋是欺诈之谋的话，那么从谋略的机理看，谋略就是建立在对对手施行“诡诈”的基础之上的：孙子对谋略最基本的论述便是“兵者，诡道也”，强调“兵不厌诈”、“兵以诈立。”又如《三十六计》便是将各计分为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等类，而并无光明之阳谋与奸邪之阴谋的区别；其瞒天过海、无中生有、浑水摸鱼、借刀杀人、笑里藏刀等谋略似乎是恶毒奸险者所用之术，其实，为正义目的而工作的谍报人员正要依靠这些谋略蒙骗敌人、掩护自己、获取情报。因此，理论形态的谋略本身只具有工具、方法的属性；而只有在某种动机驱使下付诸实施的谋略才有了美与丑、善与恶的属性，而识别的标准便是看其动机、目的：凡动机和目的符合社会的人情道德、符合历史前进的步伐、符合真理与正义的谋略，便是美的善的；反之，则是丑的恶的。

三 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的中国，历代都有许多精辟深邃的谋略理论和精妙绝伦的谋略实践。它们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思想的精华，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部漫长的中国古代发展史，也就是一部谋略的创造史和实践史。皇皇大观的《二十四史》便是中华民族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管理等诸多社会领域广泛施谋展略的国家最高谋略实践史。中国古代谋略理论也积聚了熠熠闪光的巨大宝藏，产生于西周时期的《易经》以演绎八卦的方式，作“卦

辞”、“爻辞”，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哲理和许多辩证、科学的宏观韬略，成为博大精深的谋略哲学。《老子》、《论语》、《孟子》、《韩非子》等诸子经典中均有治国安邦的宏韬大略。而论述战略战术的兵法著作，更是卷帙繁浩，内容宏富，仅存留到今天的兵书就有四五百种之多。其大要者，除了著名的《武经七书》（即《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还有《孙臆兵法》、《武经总要》、《三十六计》、《百战奇法》、《投笔肤谈》、《间书》，等等。其中最为辉煌卓越的是春秋末期杰出的军事谋略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该书今存十三篇。它总结了风云变幻、矛盾激烈的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揭示了战争的一些重要规律，提出了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核心的“伐谋”、“伐交”的“全胜”谋略思想，蕴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两千多年来，《孙子兵法》以其谋略思想的博大精深和论述的详备宏赡而受到古今中外的一致尊崇、效法，被译成英、日、俄、法、德、捷等多种文字，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仅从美国学者约翰·柯林斯的评价中即可见其一斑：“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于公元前400—320年间写成了最早的名著《兵法》。孙子的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大战略》）

确实，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谋略著作所论述的宏韬大略多能超越时代，至今已被运用到各个领域，继续放射出耀眼的光彩。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中，多

国部队（尤其是美军）在大量使用现代化高科技武器的同时，其将士也在认真研读《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古老而杰出的中国谋略著作，并从中汲取到丰富的营养。例如，以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对侵科伊军发动地面进攻以前，将大量兵力部署在科威特东部沿海海面 and 科威特南部与沙特交界处，并频频演习，做出一副将要从海上登陆和于科沙边境进攻的架势；然而在真正发动进攻的前夕，却用飞机将大量兵力突然西运到沙特与伊拉克接壤处发动进攻，出其不意地从伊拉克境内突入，迅速切断侵科伊军的退路，形成瓮中捉鳖之势。这就是典型的“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谋略在现代化条件下的生动、成功运用。由于社会生活中具有对抗竞争性的领域相当广泛，因此，兵书中的基本原理——对抗竞争性谋略对社会其他领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诚如宋人郑厚说：“《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当尽心焉。”（《艺圃折衷》）

三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创作又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中国古代如此繁富、卓越的谋略瑰宝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脂膏，而中国古代小说又以其艺术的独特手段生动、形象、典型地丰富了谋略宝库——审视古代小说，各领域、各类型奇谲曲折、扣人心弦的谋略情节五光十色、群星璀璨。可以说，丰富多采、独树一帜的谋略描写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大特色。

先秦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中所记述和表现的攻守和战之计、纵横捭阖之策、治国为政之略是小说谋略创作的思想营养和直接素材（如《东周列国志》和一些话本）。其中许多寓言故事则是古代小说谋略描写的滥觞。这些寓言故事多数是剧谈

雄辩的谋臣策士为了议谋论略或百家诸子为了说明治国方略时所作的巧妙生动的譬喻。例如，《战国策》中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楚策一），苏代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说赵惠王（燕策二），庄辛以蜻蛉、黄雀说楚襄王（楚策四），等等。被称为“寓言十九”的《庄子》则以自编寓言为主并将庄子自己置放于故事中来表现其谋略哲学思想。例如，《山木篇》以庄子与其弟子的见闻对话阐发“处于材与不材之间”的处世谋略；以“螳螂捕蝉，异鹊在后”的故事表现制谋决策必须考虑种种相互牵制的利害关系，从反面为《孙子》“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的虑谋原则作了最形象的表述。

汉魏时期，《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籍对后世小说谋略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是不言而喻的。这里要提及的是，汉代近似小说的“杂史”，其所载的人、事虽多有史实根据，但常常掺入许多虚构性的附会想象或道听途说的小说成份，在人物施谋展略方面尤为如此。例如《吴越春秋》、《越绝书》中伍子胥及越王勾践的故事，其谋略事迹便显得颇为生动。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粗具规模。无论是叙谈鬼神怪异的志怪小说还是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轶事小说”，都有一些奇诡的谋略描写，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智慧或巧诈。志怪小说中突出的是《搜神记》。例如，《干将莫邪》中刺客根据楚王悬赏儿头之情实施了献头计而将楚王刺杀。《李寄》中聪明的主人公设计以香糍引蛇出洞而将之斫死。此外，还有一些类似“宋定伯捉鬼”的故事，都描写了人物以计谋智胜狐鬼的奇闻。这为以后的神魔灵异小说（如《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的谋略创作积累了经验，轶事小说“虽不过丛残小语，而具为人间言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其谋

略描写也更切近生活而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例如《西京杂记·鸛鷀裘》描写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这对私奔的情人以当垆卖酒之策迫使卓王孙承认了其自由婚姻。《世说新语》中，曹操诓士兵“望梅止渴”；曹植七步成诗以冀豆相煎而动曹丕；吝啬鬼王戎既要出售李子又怕别人得其良种而使出“钻其核”的花招。这些奇谋、急智、诈术对故事情节的变化和人物形象的凸现产生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丛残小语”中的佼佼者常与其谋略描写密切相关。当然，这些谋略还只是“粗陈梗概”且多系较为微观、单一的具体谋术。

文人士子由朦胧进入自觉状态而“有意为小说”的唐传奇，其谋略描写已一变“丛残小语”——既独自构成完整的事件，又与主体事件溶为一体，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且叙述宛转，变化有致。其成果当以中唐为突出。例如《霍小玉传》中，豪士出于对被遗弃的小玉的同情，计邀薄幸李生往游其家而将之诱至霍小玉处。这一“暗渡陈仓”之计既使情节摇曳多姿，又对主体线索作了巧妙的粘合、过接，使之得以迅速向高潮发展。《李娃传》中描写最为精妙成功的地方之一，便是鸛母为甩掉荥阳公子而设的圈套，其实施过程颇为生动细密——在这场诡谲的骗局中，李娃、假姨、信使，每个施谋人物都出色地扮演了预定的角色，其常谈笑语、谎言托词、进退行止……真真假假，均令人感到高深莫测。鸛母的奸诈狡猾、李娃的无奈追随及公子的痴情愚顽在其谋略情节的演进中得到生动形象的刻画。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重要作用的宋元话本，其谋略描写较前迈出了一大步。首先，谋略题材领域向宽广化发展，涉及婚姻爱情、公案侠义、历史事件；而后者又直接表现了军事、政治、管理、外交等领域的种种文韬武略。例如今存的讲史类话本《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

和《全相平话五种》都是如此。第二，由于运用通俗、生动的白话进行创作，故而使谋略细节描写细致逼真，也使虑谋设计较为严谨周密。第三，谋略活动不仅仅是小说的附属成份，有的已成为整个作品的主体。例如《简帖和尚》全篇描写的便是一个奸诈狡猾的还俗和尚以恶毒的圈套骗取皇甫妻子的故事。公案侠义类的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则以宋四公智惩为富不仁的财主张富为主线，串接了一件件侠盗智取巧夺的事件，其情节颇为曲折起伏、引人入胜。宋元话本中谋略描写特点的一个重要成因，便是说话人对故事情节性的追求。“情事不奇不传。”（李渔《笠翁文集·香草亭传奇序》）话本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是诉诸听觉的语言表演艺术。为了吸引普通的市井细民，说话人必然努力使情节曲折奇特，而谋略情节的特点与之正相契合。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黄金鼎盛时代。各种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公案侠义小说、神魔灵异小说和世情小说纷纷面世，堪称争奇斗艳、各呈异彩。谋略创作描写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尤其在历史演义中，各种波诡云谲的谋略描写使历史演义大放异彩，获得了特殊的艺术魅力。可以说，奇谋胜算的智力抗衡是历史演义的活力所在：没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略描写，就没有诸葛亮、曹操、司马懿、周瑜等血肉丰满、各具个性的典型人物，就没有千古不朽、魅力无穷的《三国演义》。没有扣人心弦的斗智斗谋的描写，《东周列国志》就无法展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群雄争霸、矛盾激烈的时代面貌和历史氛围，其作品也必然索然无味、黯然失泽……

对历史演义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谁也不会否认其谋略创作成就最高者是《三国演义》，其次则是《东周列国志》。而前者以军事谋略为主，后者以政治、外交、统御为主。在描

写军阀兼并、群雄角逐的战争过程中，《三国演义》始终贯穿着孙子“上兵伐谋”的思想，斗勇中充满了斗智，斗力中贯穿着斗法。既是小说家又堪称谋略创造家的罗贯中把军事战争与错综复杂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因素结合起来描写，从而使谋略的虑谋设计更具深广度，也更为奇妙独特、变化莫测。古代谋略著作中示形、用诈、造势、谋攻、庙算、诡道、奇正、用间等基本谋略思想都在其中得到极其生动、形象的表现。罗贯中匠心独运，以如椽大笔将许多串接、集中着诸多计谋而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的精彩战役（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绘制出一幅幅既波诡云谲又波澜壮阔的艺术图卷，展现在读者面前；将历史上“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诸葛亮塑造成一个有着惊人的智谋、绝世的才能且极善神机妙算的人物，使之成为人们公认的智慧象征。

在英雄传奇小说和公案侠义小说中谋略描写也具有重要作用和地位。前者有划时代的巨著《水浒传》以及《水浒后传》《说岳全传》、《说唐全传》等；后者如《万花楼杨包狄演义》、《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彭公案》、《施公案》及“三言两拍”中的有关篇章，等等。这些作品中的英雄、豪侠、清官形象的成功塑造，无不与作者赋予其神奇的谋略施展与运用能力有关。他们或是虑谋设计的主体人物，或是施谋用计的参与角色。与历史演义相较，这类小说的谋略描写要逊色一些，但也有独到之处。我们可在《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比较中窥见其各自的优长劣短：

作为历史演义的《三国演义》，其军事、政治斗争多系国与国之间或大型军事、政治势力之间大规模的争夺较量，经常是朝臣将帅的斗智恃强和千军万马的冲锋陷阵，场面浩大，背景

壮阔，气势恢宏。其，韬略机谋多讲究正规的兵法阵机的无穷推演、万千变化，而且如前所述，其军事谋略常常与政治、外交、经济等因素纵横交错地揉合在一起，互相作用，使立谋虑略的思维活动更为立体化、更具拓展性；同时，角逐各方基本是势均力敌的公开抗衡，各方都力求借助智慧的力量制胜，故施谋运略常是双向性甚至是多向性的——互相用计、将计就计最后看谁智高一筹的斗智斗谋的较量纠葛交织、充满作品。因而，其谋略描写就显得紧张激烈、错综复杂、惊心动魄、扣人心弦。

作为英雄传奇小说的《水浒传》，描写的是绿林好汉、草泽英雄与封建朝廷尤其是与地方邪恶势力的对抗。虽然梁山泊义军达到相当实力，但并未具备大规模进攻的作战能力，然而其一百零八条好汉多身怀诸如飞墙走壁、水底埋伏、高速行走或各种鸡鸣狗盗式的神奇绝技，其宗旨是除暴安良、扶危济困、替天行道，打击目标常是地方上少数作恶多端的贪官恶霸，因而其机谋韬略的特点是：常与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相结合，瞄准少数施谋目标，依靠一个或多个好汉义士的绝技巧行诈术而一举成功；即使是大规模对抗冲突中的谋略，也充分利用各类英雄人物的绝技予以构设。与《三国演义》相较，其计谋更具伪诈性，同时也更具传奇性，充分表现了绿林英雄、江湖好汉侠义神奇的浪漫特征。《孙子兵法》认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意即战争之事无非是正兵与奇兵的交互使用。一般认为，“正兵”即以正规作战之法整然实施；“奇兵”即攻其无备、出奇制胜。于此意义看，如果说《三国演义》的文韬武略是建立在“正兵”与“奇兵”交互使用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水浒传》中的计谋术略则更多的是非正规的“奇兵”，具有挟绝技而出奇谋的特色。因其绝技高超非凡、出人意料，故其谋略也往往能达到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境地；其谋略描写的

艺术效果主要不是以紧张激烈而扣人心弦，而是以神奇妙趣引人入胜。然而，正因为其虑谋设计的立足点更多地依靠略谋实施者的素质、才能、技艺，故其谋略本身的复杂性、深刻性、周密性、智慧性，也就不及主要依靠智谋本身的胜算而克敌的《三国演义》。同时，《水浒传》主要是正义与邪恶的搏斗，双方泾渭分明，但力量悬殊，而作者歌颂真善美和憎恶假恶丑的褒贬态度又十分鲜明，因此，客观上处于弱勢的正义一方更需要借助智慧的力量制胜（邪恶势力则恃凭其强权、实力为恶），而作者主观上又更愿意以智慧的光彩去塑造他所宠爱的这些英雄，故作品中施谋展略的指向多是单向性的，即水泊英雄对贪官恶霸的用谋。此外，其施谋领域也相当广泛，如杀伐搏击、惩恶报怨、智取巧夺、招贤纳士、扶危济困，但主要不在高层的君臣将帅之间而在官民之间展开，故更贴近社会日常生活。

谋略在明清神魔灵异小说中也大显身手，其类型基本是暗渡陈仓、偷梁换柱、金蝉脱壳、无中生有，等等。但它们更多的是建立在施谋者变化万端的神奇法术之上，故虽就谋略表层和故事情节而言颇有出奇制胜之巧、翻云覆雨之妙，但从谋略构思设计来看，则显得比较简单、平浅。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较快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在一些地区出现。随着城市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发展，显性的竞争已渗透到经济、管理、婚姻、家庭、交际、教化等世情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唯利是图、金钱至上、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消极思想和封建主义没落思想也日趋突出。另一方面，思想文化领域产生的个性解放等进步人文因素，又呼唤着人们对自由婚姻爱情的追求和表现。社会生活的竞争性和思想心理的丰富性促使世情生活中谋略大量产生；而这又为世情小说从各个方面描写种

种光怪陆离的计谋术略提供了丰富的源泉。长篇世情小说中当以《金瓶梅》和《红楼梦》的谋略描写最为丰富，最具成就；而在短篇小说中当数“三言两拍”为然。

审视长篇世情小说，可以看到，其中奸诈为恶之谋多于智巧为善之谋。《金瓶梅》中，妻妾争宠、母婿乱伦、娼妓竞淫、帮闲凑趣、主仆相害、三姑六婆攻讦拆台、官商恶霸沆瀣一气……各怀鬼胎的施谋者为了实现其卑鄙、无耻、罪恶的目的，处心积虑而又不动声色地构设着诸如借刀杀人、挑拨离间、谋妻夺女、栽赃陷害、行贿受贿、结党营私之类的诡计。在《金瓶梅》长长的人物形象画廊中有一大半比较主要的人物都施用过奸诈谋术——谋略渗透在每一个细小而又肮脏的角落，成了邪恶任意驱使的奴隶。《红楼梦》中的奸邪之谋也颇为可观：一心保官的贾雨村与门子合谋徇情枉法而有“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嘴甜心苦，两面三刀”的王熙凤既“弄小巧用借剑杀人”，“逼尤二姐吞生金自逝”，又“瞒消息”“设奇谋”骗宝、钗成婚；心术狡狠的赵姨娘买通马道婆“暗里算计”宝玉、凤姐，使之“魔魔法叔嫂逢五鬼”；淫乱不轨的夏金桂及其婢女为了勾引薛蝌、害死香菱，先“纵淫心宝蟾工设计”，继而“施毒计金桂自焚身”……妻妾的争风吃醋、嫡庶的争权夺利、主婢的狼狈为奸，一连串邪恶的计谋同样被人们玩弄着，如同王熙凤所说“咱们家所有这些管家奶奶，哪一个是好缠的……‘坐山观虎斗’，‘借刀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了油瓶儿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本事”。（第十六回）长篇世情小说中为恶之诡计所以多于为善之智谋，是因为：这些作品多系批判现实主义之作。18世纪德国著名的启蒙家席勒的《强盗（第一版）·序言》说：“谁要是抱着摧毁罪恶的目的……那么，他就必须把罪恶的一切丑态在光天化日之